

薛勇民 著

走向 生态价值的深处

后现代环境伦理学的当代诠释

ZouXiang
Shengtai
Jiazhi de
ShenChu

HOUXIANDAIHUANJING
LUNLIXUEDE
DANGDAIQUANSHI

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薛勇民 著

走向 生态价值的深处

后现代环境伦理学的当代诠释

ZouXiang
Shengtai
Jiazhi de
Shenchu

HOUXIANDAIHUANJING
LUNLIXUEDE
DANGDAIQUANSHI

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走向生态价值的深处 / 薛勇民著. —太原: 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6. 5

(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文库)

ISBN 7-5377-2713-9

I. 走... II. 薛... III. 生态环境—研究
IV. X17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24357 号

走向生态价值的深处

著 者 薛勇民
责任编辑 王跃平
助理编辑 刘爱华
装帧设计 陈永平
版式设计 王跃平
出版发行 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社 址 太原市建设南路 21 号
<http://www.sxstph.com.cn>
邮 编 030012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太原兴晋科技印刷厂
版 次 2006 年 5 月太原第 1 版
2006 年 5 月太原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15.75
字 数 205
书 号 ISBN 7-5377-2713-9/Z·597
定 价 30.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薛勇民，男，1964年8月出生於山西省萬榮縣。

壬戌之秋，從其少志，讀哲學於山大學堂，尋思辨於古今聖賢。為學從教，已逾二十寒暑，雖沒有驚世駭俗之作，卻不失安身立命之本。求學問道，則學而不厭，虛心而慎言；授業解惑，則誨人不倦，理明而治嚴。至於今者，剛逾不惑，事業小成，然無意於名利之爭，淡泊於世俗之見。身兼政務而不流於俗，志在學問而不失於迂；求通达世事而不易其誠意，拒俗物紛擾而不改其本心。平生夙願，只在三尺講台，盡展理性睿智；為人做事，但凭一身正氣，竭鑄智慧人生！正所謂：“心泰身安是歸處，文抒人生樂作情。”

現為山西大學哲學社會學學院教授，哲學博士，博士研究生導師。現任山西大學成人教育學院常務副院長兼職業技術學院院長。

《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文库》编委会

主编 郭贵春

编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孔富安 成素梅 乔瑞金 杨小明

李 红 张汉静 张培富 郭剑波

郭贵春 高 策 殷 杰 魏屹东

内容提要

如果对 20 世纪人类文明的历史发展作一整体鸟瞰,无疑,最为鼓舞人心和令人激动的文明成果就是全球性的生态觉悟和后现代的生态智慧的出现。这一文明成果在其现实性上,肇始于对人类生存环境和未来发展命运的关注;而在其历史意境上,则是对潜藏于人类文明胚胎中的文明觉悟的更高基础上的“复归”。应当说,它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程中有着极为深刻而普遍的哲学意义。

为此,本论著探讨的主题是:对 20 世纪兴起和形成的环境伦理和生态智慧进行后现代方法论的诠释。基本观点是:环境伦理思想与后现代主义哲学具有内在的同一性。研究目标是:为当前合理解读环境伦理观念确立一种生态视野和生态理念,为科学研究环境伦理思想提供一种方法论和价值观。

本论著的基本内容由以下六章构成。

第一章 引论:环境伦理学的后现代诠释概要。本部分简要地介绍了对环境伦理思想进行后现代诠释的基本策略和理论框架。

第二章 环境伦理学与后现代性。本部分主要从环境伦理学和后现代思想的产生和本质上,分析了环境伦理与

后现代精神的关联性，揭示了当代生态世界观的后现代特征，论述了后现代环境伦理的方法论意义。

第三章 现代性的困境与环境伦理学的后现代转向。本部分从反思现代性的困境开始，主要分析了传统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危机，揭示了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合法性确立及其后现代意蕴，论述了具有典型意义的后现代先驱——海德格尔的环境伦理思想。

第四章 理性的消解与后现代环境伦理观。本部分集中探讨了当代最为著名的环境伦理学家罗尔斯顿的自然价值论及其后现代意义，分析了当代环境运动中最有影响的深生态学理论的后现代价值观，最后简要解析了当代西方绿色思潮中最具后现代意识的环境哲学——生态女性主义理论。

第五章 后现代环境伦理的技术与文化判据。本部分主要基于后现代环境伦理立场对当前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进行了深入的归因，讨论了科技价值与作用的合法性，提出了当代科学技术的生态转向及其意义，分析了环境伦理观念变革的后现代伦理文化根据和价值观依据。

第六章 结语：环境伦理学的后现代对话与发展。本部分将环境伦理观念与后现代思想的内在同一性提升到一种后现代全球意识和全球伦理的价值观高度，简要阐释了后现代环境伦理学的建构原则，指出了后现代环境伦理学的发展方向。

总 序

20 世纪科学技术哲学的发展呈现出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图景，正在达到一个激动人心的时代。它的进步和走向，不仅生动地与科学技术哲学的特定流派和相关问题的提出、展开、演进以及求解紧密地联结在一起，而且表现在科学技术哲学自身界域的扩展、学科内在规范的建立，以及特别是科学研究中学科共同体的逐步形成当中。这后一方面，对于科学技术哲学学科建设而言，意义显得尤为重要。

伴随着对科学理性和科学民主的追求，科学技术哲学的思想和观念在 20 世纪初登陆中国，后来逐渐内化于自然辩证法的研究当中，成为兼具思维改造和社会实践双重功效的学科领域，从而得以生根发展。尤其是在最近 20 年中，中国科学技术哲学领域的发展是令人瞩目的。科学技术应用于社会实践和人类发展中所造成各种问题和矛盾日益加剧和激化，使得关于科学技术反思的各个领域如雨后春笋般突现出来。科技伦理学、科技政治学、科学社会学、STS 研

究等交叉学科和边缘学科的出现，使得科学技术哲学学科几乎渗入到所有科学的研究领域，呈现出一片学术繁荣的景象。但是这种表面优良的学术生态环境，却难以掩盖令人堪忧的中国科学技术哲学的学科建设和内在规范本身的发展状况。科学技术哲学本质上隶属于哲学学科，这是它的学术根基和特征所在，科学技术是它的对象和内容，这是其获得持久发展的生命力和根源所在。如果学科本身的学科建设和内在规范不能够获得有效的建立，不能够确立明确纲领和方向的话，无论我们如何投入多少精力和时间致力于学术层面的研究和实践，都不足以使该学科获得质的飞跃。

因此，中国科学技术哲学不仅要弥补历史造成的传统不足和基础欠缺，而且要追踪国际科学技术哲学最新发展的前沿；同时，还要在自身的基底上探索可被接受的形式和特点。这一过程是长期的、艰难的和曲折的，但同时也是可以取得进步和获得卓有成效成就的正确方向。如果仅仅为了暂时的学科生存和获得较多学术资源，过分迎合某种外在于学科的需要，以所谓热点问题和现实问题为基本的研究取向，受制于学科外力的牵引而不是学科本身发展的内在拉动，那么，中国科学技术哲学的发展将永远处于一种人云亦云、亦步亦趋的状态，我们只会跟着各种“思潮”和“热点”疲于奔命，根本谈不上学术的积累和进步、人才的培养和继承，更难奢求研究的深入和层次的提高。因此，我们需要默默耕耘、苦心孤诣的学术精神，需要抛弃浮华的心理而勇于潜心理论研究的学术态度，需要在科学理性和科学民主指引的方向上，努力建构自己的知识体系和学派特征。这就要求我们敢于面对科学技术哲学的“哲学”本质，绝不能因为哲

学的贫困就从事贫困的哲学，不加限制地随意扩展科学技术哲学的界域，邀宠于学科之外的因素。

科学技术哲学的学科建设和内在规范的建立，由此就不是简单地依赖于机器、设备等硬件建设能够完成的，从目前的发展看，至少需要着重于以下几方面：其一，以“学派”建设为核心，形成特定的科学研究共同体。有了确定的研究目标和明确的研究纲领，不仅可以形成特定的方向一致的研究共同体，而且进而便于加强国际国内的合作和交流，对接和对话，促进学科的整体发展。其二，坚持“主流”研究方向，扎根于基础理论的研究和前沿理论的探索。这就要求在研究内容和领域的选择中，特别要注意坚持理论研究的长期性和深入性，既不崇外，更不媚俗，扎扎实实地抓好本学科基础理论的建设，译介一批国际科学技术哲学经典文献；同时，还要紧密关注国际最新理论的发展，立足于高起点，坚持研究的前沿性和国际性。其三，培育优秀的学科带头人，鼓励愿意长期致力于科学技术哲学理论研究的人才脱颖而出。人才建设始终是学科建设的重要的和基础的部分，优秀的学科领军人物的出现，既可以起到带头和示范的作用，更是学科成熟的标志之一；同时，要想使学科保持长久旺盛的发展势头，必须注意学术研究人员的梯队建设，在学术团队内形成良性的人才培养和更迭机制。

在近20年的发展过程中，山西大学的科学技术哲学学科沿着这样的学科发展和建设思路，既经历了中国科学技术哲学的艰难与曲折，也见证和推动了它的进步与辉煌。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创建、90年代的壮大到今天的全面发展，从自然辩证法研究室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从山西省重点学科到国家

重点学科，在步入 21 世纪之际，以科学哲学为核心研究方向和主要支撑点的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学科群获得了跨越式发展和历史性突破。在这些卓有成效的工作后面，是厚重的学术积淀，它们凝聚着一代又一代山大学人对于科学理性和科学民主永不停息的追求，记载着我们在科学研究和学科建设上所付出的艰辛努力和走过的辉煌历程。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目前形成了三个主要的研究方向：

一是科学哲学研究。其特色研究包括（1）以科学实在论的研究为基点，从理论构架、历史演变和个案分析三个方面对科学哲学中的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进行析解，在系统研究测量实在论、经验实在论、语义实在论、整体实在论、系统实在论和语境实在论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科学实在论体系。从“语言学转向”、“解释学转向”及“修辞学转向”的历史意义出发，分析了科学哲学在意义理论、语义分析方法、自然主义倾向及经验建构等方面所表现的“后现代”特征及其在中国的表现形态和意义，该研究在国内独树一帜。（2）从因果性和决定论这一科学哲学的基本论题出发，对量子力学、休谟问题等做了系统和深入的认识论与逻辑学诠释，多角度建构了独具特色的因果模型。（3）以科学活动为研究核心，从后现代思潮、后实证主义、反本质主义和系统主义多视角探讨了科学哲学的合理重建、科学运行的价值规范等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4）对自然科学的重要前沿问题，如量子力学、规范场理论、非线性科学和基因工程等做了深入的哲学研究，与自然科学的最新发展保持一致。

二是技术哲学与 STS 研究。其特色研究包括（1）技术哲学基础理论研究。包括马克思技术哲学思想研

究。在技术的定义、类型、起源和发展的逻辑结构，技术进步与生产方式变革，技术进步与人的自由，技术进步的经济协同效应与文化协同效应，技术进步与环境结构的变迁等方面已有突破，在理论上初步形成自己的体系；技术社会学研究对技术的社会的本质、技术的社会运行机制以及技术对社会的影响等方面做了深入的探讨，基本形成技术社会学的框架；技术伦理学的研究从广义价值论和狭义价值论视角，探讨了技术的伦理本质，提出并研究了技术伦理的系统功利主义、行为功利主义和准则功利主义，形成了自己的技术伦理学理论；科学技术生产力研究，对科学、技术与生产的关系做了奠基性的工作，提出了自己的科技生产力观。（2）工程主义技术哲学与人文主义技术哲学整合研究。就像科学主义哲学和人文主义哲学各有局限性一样，工程技术主义哲学和人文主义技术哲学也同样各有局限性，从整体上对二者进行整合研究必将对技术的本质有更深刻的认识。（3）STS应用研究。包括对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原理、技术方法、评价体系、发展模式、区域案例等进行了研究；对科技政策、科技体制、科技管理、科技决策进行了研究，为政府制定法规、科学决策提供理论依据。

三是科学思想史研究。其研究特色包括（1）科学思想史基础理论研究。对科学思想史进行了系统的理论研究，揭示了人类科学思想发生的根源、模式和规律，展示了人类科学思想的精华和社会进步的科学基础，基本形成了国内科学思想史的理论体系。（2）科学家科学思想研究。对巴斯德、诺贝尔、爱因斯坦、玻尔、海森堡、杨振宁等科学大师的科学思想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形成了科学家系列思想文库。正在进行的华人科学大师科学思想的研究，将不

断完善和深化该研究领域。(3) 中国地方科学思想史研究。开创了地方科学思想史研究的新思路和新领域,形成了特定的研究模式。(4) 科学思想史与相关领域的交叉研究。将科学思想史研究与科学哲学研究相结合;科学思想史研究与技术哲学研究相结合;一般科学思想史研究与科学家思想史研究相结合;西方科学思想史研究与中国科学思想史研究相结合,形成多学科、多方向、纵横交叉的科学思想史研究的特色。

山西大学所做的这些工作开拓性地把国内科学技术哲学的研究推进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同时,也为在科学技术哲学方面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先在的理论背景和坚实的知识基础。

为了更坚定地保持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长期以来形成的学术特征和持久的学术惯性,进一步发挥我们的学术优势和巩固业已形成的良性发展态势,以积极的姿态推进中国科学技术哲学的学科建设和内在规范的建立,继续鼓励科学技术哲学基础理论研究和前沿理论的探索,我们于2003年启动了《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文库》。

这批专著以科学技术哲学基础理论和前沿理论的研究为核心,坚持理论性和学术性,保持国际性和前瞻性。它们是以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博士点为核心的科学技术哲学国家重点学科的诸位同仁近年来持续不断地进行理论探索所取得的阶段性成果,是该重点学科在不断发展壮大和进行学科建设中取得进步的重要标志,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们近期所关注的主要问题和取得的重要成果,代表了一定的学术水平和科研层次,表达了我们对科学技术哲学相关问题的理解和领悟。我们要求它们能够既保证研究的专业性

和高水准，更能够具有较大的覆盖面和读者群，为中国的学科建设和理论发展做一点实实在在的事情。我们期望能够集腋成裘，持续下去，渐成规模，产生良好的学术效应，更期望通过它们的出版，能够为中国科学技术哲学界注入新的活力和生机，激发学界同行能够继续以高昂的热情关注于中国科学技术哲学学科的发展。

作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和国家重点学科，我们清楚自己肩上所承载的学科建设的重担，我们的命运不可避免地与中国科学技术哲学发展的前途联系在了一起。因此，在刚刚迈入 21 世纪的今天，我们设立了这一文库，不仅希望在科学技术哲学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上进一步贡献自己的力量，展示我们的研究特色和水平，借以形成自身的某种学派特征，而且期待着，科学技术哲学能够在未来充满希望的世纪中，在建构自身发展基点，探求进一步的生长形式中，为人类找到美好的精神家园。我们坚信，哲学理性的星空，将因为人类对科学智慧的永恒渴望和不断探索而更加璀璨夺目。

郭 贵 春

2003 年 6 月于山西大学

前言

回眸 20 世纪以来人类的整体发展，有许多的重大文明成果令人欢呼雀跃，人们无不为之相对论、控制论、信息论等新科学理论和电子技术、空间技术、“克隆”技术等新技术发明的出现而倍感骄傲。

与此同时，有一本“绿色”图书——《寂静的春天》却足以使所有的人心灵震撼。这本书从一个侧面向人们昭示了人与自然关系在 20 世纪 50 年代以后所出现的总体性危机。书的作者以极为伤感的笔调写到：一切都处于异乎寻常的寂静中。园中鸟儿觅食的地方冷清，房屋后花园里的饲料盆始终空着，间或能看见的几只鸟儿也浑身直抖，再也飞不起来。农场的母鸡仍孵蛋，却没有雏鸡钻出来。母猪产下的猪崽甚少，而且只能存活数日。苹果树花依然在开，但再也看不到授粉的蜜蜂。曾经是引人入胜的道路两旁，如今排列着的是仿佛被火灾洗劫过的枯萎的植物。小溪也失去了活力，因为河里的鱼已经绝迹……这里，曾经荡漾着鸬鹚、鸽子和鹈鹕的合唱，以及其他鸟鸣

的声浪，现在却一片死寂。这是一个寂静的、死气沉沉的春天……

《寂静的春天》给我们所描绘的就是当代人类在工业化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面对这一日益严重的全球困境，人们已从社会、经济、人口、科学、技术等方面进行了必要的阐释并积极寻求出路，也取得了许多可喜的研究成果。20世纪60年代以来方兴未艾的环境伦理学或生态伦理学^①正是在回应和辩答这一困境的过程中所获得的一大硕果。

自从环境伦理学产生以来，世界范围内的环境伦理学研究开展得十分深入，发展极为迅速。但不同时期的环境伦理学的研究，侧重点并不相同。起初，环境伦理学家们主要探讨了环境伦理学的学科定位、性质与特征；之后，人们则集中对环境伦理学进行“流派”划分的研究。随着研究的日益深入，到了20世纪80年代的后期，初步形成了人类中心主义、动物解放论/权利论、生物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四大派别的环境伦理学格局。到目前为止，国内外环境伦理学界主要集中于这一理论格局进行了广泛的探讨。

如果说20世纪90年代以前，环境伦理学研究处于不同流派纷争的“百家争鸣”时期，那么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环境伦理学研究则进入了各个流派的深化整合时期。

令人遗憾的是，在国内外学术界，环境伦理学家们对于伴随着环境主义运动和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而出现的环境伦理学或生态伦理学理论的研究，却长时期没有能够在整体的研究范式上确立起环境整体主

^① 一般认为，作为一门独立的哲学学科，环境伦理学或生态伦理学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

义的世界观基础和后现代主义的方法论视角^①。只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前后，西方学术界才把深入探讨后现代思想与环境伦理学之间的关系作为当代环境伦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并取得了一些初步的研究成果。如瑞默曼的《为地球的未来而抗争：激进生态学与后现代性》（1994年），从后现代主义的角度探讨了激进生态学的三个主要流派（深层生态学、生态女性主义和社会生态学）的理论得失；奥斯切理格主编的《后现代环境伦理学》（1995年），则分别从“语言学与环境伦理学”、“环境伦理学、后现代政治学及其他”和“反思环境伦理学”三个方面阐述了后现代主义与环境伦理学的关联性。

而在我国学术界，近年来虽然也有学者开始关注后现代主义与环境伦理学的关系问题，出现了一些专题研究论文，如杨通进的《整合与超越：走向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伦理学》（1999年）、李霞的《女性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对立与融合》（1998年）等，但总体上看，在这一维度上的研究还不够深入，极不系统。对这一课题的研究还基本停留在一般意义的关注、倡导和呼吁上，至多是对环境伦理学的某一流派或某一环境伦理学家的某一思想进行一般化的论述和分析，而没有从整体和系统的角度对具有重要意义的环境伦理学与后现代主义之间的关联及其实质进行深入的认识和把握。

为此，本书的核心是系统地考察和论证环境伦理

① 尽管人们对环境整体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还存在这样或那样的意见分歧，尤其是对后现代主义的局限乃至错误提出了严厉批评。但是，后现代主义对待现代性和人类社会未来命运的态度却是值得肯定的，其分析问题的角度和解决问题的思路却是我们应当坚持的。